**第八届“企业社会责任”征文大赛**

**The seventh CSR Paper COMPETITION -2012**

**论文**

**中国媒体伦理现状及对策**

**姓名** 李春慧 张倩 刘佳莹

**学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专业**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联系方式** 18810954303

**时间**  2015  **年** 3 **月** 20 **日**

大赛论文（设计）诚信声明书

本人声明：我所提交的大赛论文（设计）《中国媒体伦理现状及对策》是我们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研究、写作的成果，论文中所引用他人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发布的文字、研究成果，均在论文中加以说明；有关教师、同学和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写作、修订提出过并为我在论文中加以采纳的意见、建议，均已在我的致谢辞中加以说明并深致谢意。

论文作者 李春慧 张倩 刘佳莹 （签字） 时间：2015年3月20日

**中国媒体伦理现状及对策**

李春慧 张倩 刘佳莹

# 摘要

“伦理”是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准则上的理性过程。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平台。随着新型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主流媒体的不断改革，媒体伦理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就目前媒体的现状做了简单描述，并就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中的媒体伦理问题，中外媒体的对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本文还探究了媒体伦理道德的建设方法，希望对构建媒体伦理提供合理的建议。

关键字**：**媒体伦理 自媒体 媒介事件

目录

[摘要 3](#_Toc415438029)

[关键字 3](#_Toc415438030)

[一、媒体伦理概况 5](#_Toc415438031)

[（一） 主流媒体——媒介事件 6](#_Toc415438032)

[（二）自媒体——以微博为例 8](#_Toc415438033)

[三、中外媒体伦理的对比 12](#_Toc415438034)

[（一）媒体素养教育 12](#_Toc415438035)

[（二）对数字的敏感度不同 13](#_Toc415438036)

[（三）对新闻认识的差异 13](#_Toc415438037)

[（四）灾难新闻报道的不同 13](#_Toc415438038)

[（五）对社会报道的不同 14](#_Toc415438039)

[（六）受众不同 15](#_Toc415438040)

[（七）总结 15](#_Toc415438041)

[四、启示 15](#_Toc415438042)

[（一）完善新闻媒体界法律、监督制度 16](#_Toc415438043)

[（二）杜绝虚假新闻、坚守道德情操 17](#_Toc415438044)

[（三）秉承核心价值观（去网络群体极化） 17](#_Toc415438045)

[（四）全方面交流，多方面换位思考（自媒体与主流媒体的互动） 18](#_Toc415438046)

[（五）构建新闻伦理体系 18](#_Toc415438047)

[参考文献 20](#_Toc415438048)

# 

# 一、媒体伦理概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微博、微信、社区论坛、贴吧等方式以其自身使用人群广、传播速度快、转发量大等特点，已经逐步变成了传播主体。这些网络平台不仅仅成为公共事件的爆发处，更进一步变成了关于热点评论的发酵池。网络平台以其自身的传播方式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处理、信息加工，对网络舆论、新闻舆论、社会舆论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有时会牵动某一事件的发展方向。以微博为例，自2010年微博迅速发展以来，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11年,微博己经超越网络论坛,跃升成为第二，如今微博的用户已经超过5亿，日均发帖量达2亿多条。随着微博运用日益普遍,微博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明显增强。媒体自身的多样性、迅速性、广泛性也对突发事件的各方面的舆论影响产生了一定的风险。由此，就需要更加注重媒体伦理的重要性。

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媒体体制相对改革也逐步推进，媒体本身的市场化程度也随之越来越高。在此现实条件下，一方面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对经济利益考核指标偏于简单，由于管理和经营水平参差不齐等的原因，一部分媒体在其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一定冲突的现实社会中，部分媒体会在潜意识中偏好于前者，更有甚者，一部分初始发展的媒体，为了生存的需要走入了娱乐化、低俗化的误区。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常常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事实真相进行相对的掩盖和歪曲，误导受众；一些新闻的报道甚至有违于伦理道德，在利益的驱使下侵犯公众名誉权和隐私权，或者在报道时就带有自身主观色彩……这些新闻乱象逐步引发了人们对媒体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

近几年，媒体通过网络对突发事实的披露和追踪成为其传播新闻的主要手段，而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将最新信息的获取重心转移到网络平台上。近期在我们身边发生很大反响的事件，大部分都是由微博等网络媒体首先爆出事实、经由转发和评论逐渐增加了关注度，从而引起了大众的广泛讨论和重视的。近期为大众广泛熟知的事件基本上均由微博等便捷媒体曝出：“西安凤城医院手术室自拍事件”在大众媒体上引发了关于医德伦理的轩然大波，在微博博主曝出照片的一瞬间各大新闻媒体加以评论转发，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但是作为社会公共的发言人他们却利用了公众对媒体人的十足信任引领了舆论的导向，未经核实即可报道，让整个事件从开始就不再客观，医德固然是重若泰山，但是媒体伦理的道德并非轻如鸿毛；同样，2015年引起社会各界争论的还有歌手姚贝娜逝世的新闻报道，姚贝娜离世后的偷拍事件，相关媒体和记者的对尸体未经允许进行拍摄的种种行为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也违背了新闻伦理，破坏了公序良俗，媒体人认为的“敬职敬业” 却对弱者造成了“二次伤害”。我们无法抹平逝者离去的悲伤，但可以对逝者少一份伤害多一份尊重，这是起码的公序良俗……

**二、媒体伦理现状分析**

## （一） 主流媒体——媒介事件

主流媒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强大的支撑作用。[[1]](#footnote-1)主流媒体是主要面向社会中的主流人群的相关媒体。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判断主流媒体有六条标准：

１、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

２、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

３、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

４、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纪录者；

５、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

６、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2]](#footnote-2)

由此看来，主流媒体所占领的信息具有极大的政治色彩，并且信息量大、影响范围广，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不同层面的反馈。因此，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但是，相对来说主流媒体对于事实的报道有时就会有相关“媒介事件”的产生，对舆论进行引导。这里的“媒介事件”就是指经过某“组织”（政府、政党团体、企业、社团等）有计划、有目的的策划并执行，以大众媒体为媒介和渠道，向受众进行有目的传播的事件及其过程。[[3]](#footnote-3)

媒介为了达到一定的主观上的需求，有时会相应改变一定的新闻生产模式，从而产生相关媒体所要求的一定价值的新闻，并且产生了以媒体媒介的方式重构新闻事件的现象，进而使得本来习以为常平凡的事情变得极为不平凡，以彰显某些感情色彩，放大新闻效应，引人注目，导致事件的发展方向有预定的变化。

“媒介事件”分为正面媒介事件和负面媒介事件，一般的，为了达到社会公正和谐的目的，为了揭露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贪污腐败，司法不公促使社会秩序混乱等，存在善意的报道动机，并且能够遵守新闻报道的相关规律以及新闻伦理道德的伦理基础，善意地加入一定的渲染的成分，来达到教育群众、张扬正义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此类媒介事件称之为正面性媒介事件。反之， 有的媒体利用传媒的作用对事件进行鼓吹渲染等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忽略了事实的基本产生和发展，为某些经济利益而违背新闻媒体的伦理的事件，例如为求轰动一时的效应，大肆這染、夸张且扭曲事实，或者制造虚假信息，违背新闻报道规律，违背新闻伦理道德，此类媒介事件称之为负面性媒介事件。[[4]](#footnote-4)

在正面的媒介事件中，我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http://baike.haosou.com/doc/4811770.html)、[中央人民广播电台](http://baike.haosou.com/doc/2738155.html)、《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等在对国家大事或是相关的政治方面报道时做到了客观，实事求是的事实陈述。有一年一度的“两会”报道，关注过去一年中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踪迹以及新一年的计划；有“感动中国”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引领，用生活中平凡却伟大的真人真事教育社会各界的人，促进整体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思想道德的升华；有“3·15打假”在日常生活中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关注……

而负面的媒介事件在生活中也数见不鲜。例如在综艺节目盛行的娱乐界中，为了收视率等相关比率的要求，开启了一系列真人秀节目。消费者不仅仅局限于综艺节目的节目效果，还在节目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对节目的录制现场进行探访。一方面的确增加了该现场的游客到访量，但是，更大的层面上，对于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也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影响。同样的，有些旅游地为了游客量的提升，不顾环境承载力的大小，肆意进行旅游宣传等，破坏旅游地环境，也破坏了当地的人文环境保存。在这一方面，利益的驱使使得媒介事件发挥了并不乐观的效果。另外，2011——2012年的中国特产报因新闻敲诈事件：该报记者搞有偿新闻、多名记者进行新闻敲诈、利用网络编发虚假新闻等违法违规事实引起对新闻媒体的道德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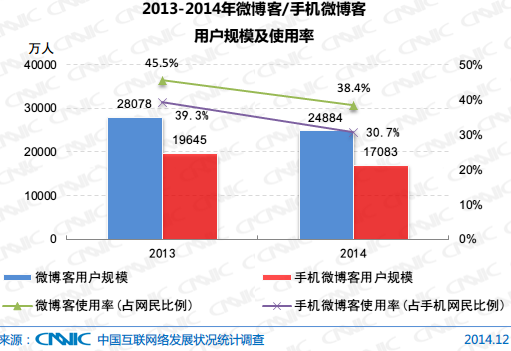
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信息发布平台，不仅仅要侧重于“新闻事件”、“新闻策划”的重头戏，更要突出新闻伦理道德的重要风向标作用。作为权威的信息发布中心，主流媒体更加侧重的并非利益的趋同或是“头条”的归属，它们所反映的更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走向。在信息迅速公开化的社会中，主流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就极为重要。

## （二）自媒体——以微博为例

“We Media”(自媒体)是由专栏作家丹·吉尔默在2002年的年底首先提出来的，他在文章中指出；“以网络空间和博客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的诞生，改变了传统新闻的传播流程”并且他认为；“We Media”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而媒体变迁的路线是：旧媒体——新媒体——自媒体。2003年7月,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We Media (自媒体)”的研究报告中，对自媒体下了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5]](#footnote-5)

自媒体以草根媒体著称，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步渗人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其广泛性、迅速性渗透到信息的产生、获取、选择、再加工到之后的传播等等各个方面。自媒体运用网络技术大大降低了以个人为单位的媒体评论进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门槛，使得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不论是个体还是媒体团体都在进行着信息互换和互评，没有准确的首发信息，更没有准确的信息归属，参与者相互利用对方的信息，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中，微博就是自媒体时代下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其中自发的个人性质的微博占了主要的比例。

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较2013年底减少3194万，网民使用率为38.4%，与去年年底相比下降了7.1个百分点。虽然微博急速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但是微博依旧占据了大部分信息发送接收的主要比重。相当一部分用户访问和发送微博的行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上，截至2014年底手机微博客用户数为1.71亿，相比2013年底下降2562万，使用率为30.7% 。[[6]](#footnote-6)



以微博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2014年上半年 “马航事件”和2014年下半年的“冰桶挑战”彰显了新浪微博作为社交媒体的快速的传播速度、深远的传播范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在“马航事件”最初期，国内主流媒体通过新浪微博与国际同轨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现状， 国内媒体微博成为了最新消息的重要来源。同时，在自媒体方面，随着事件的不断升温，公众对于信息的渴求也急剧膨胀。在此情形下，早已习惯于在相关微博和微信中找寻真心的数亿网友也蜂拥而至。面对现下的巨大信息需求与信息真空现状，主流媒体微博积极主动与派驻的记者相联络，尽力拓展深挖消息源。人民日报的多位记者从越南、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交通部发回“飞机行至越南胡志明市时通讯失效”“我两艘大型专业救助船已向疑似坠机海域推进”等多条官方消息，被@人民日报，在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与当局的广泛关注。央视新闻频道也先后派出近20路记者，成为@央视新闻　有能力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保障。在3月8日事发当天@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视点 三大媒体微博共计发布事件微博123条，吸引了130万网友参与转评。其中，来自独家前方记者报道占35％，较大程度上独家呈现传递了各方声音。也许微博并不能真正解决“马航事件”，但却可以用属于它自身的力量推动真相的出现。从马来西亚政府发布会、中国派出专门工作组到越南出动舰机全力搜救，再从马航公司表态到波音公司技术分析，从官方权威、学者解读，到美联社、路透社多方报道等等，在这起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下，国内外各方面的原生态消息在中国媒体微博以及中国国内参与的努力下，以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的形式全面呈现在网民面前。

当然，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利好的情形下必然会有不利的一面。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有Twitter网友评论：“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 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这样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国内自媒体上。在马航事件发生的24小时中，不切实际的传言也伴随着真实性的信息转发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快速生长蔓延，信息的喷发也夹杂着各种情绪和声音的蔓延，一些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和肆意评论也一时间占据了互联网媒体的搜索头条。据新浪微博统计，仅就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已处理不实信息400余条，可见不实消息传播之盛。这样的不实信息不仅不会给事件的解决创造良好环境，反而会煽动不稳定情绪的爆发，同时也在无形之中伤害了受难者家属。自媒体自身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导致其信息可信度较低、集体选择盲目性等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道德伦理的缺失给自媒体主体、自媒体本身以及社会带了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这不仅仅违背了自媒体自身发展的初衷,还违背了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秩序，也同时威胁了社会的安全。在此，相关的新闻伦理对家属的保护就显得极其重要。作为自媒体的代表，微博的利益价值选择也变得极为重要。

同样的，2014年7月，微博上最火热的话题莫过于围观一群成功人士的“湿身”运动。从国外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苹果现任CEO库克，再到小米雷军、360周鸿祎湿、富士康郭台铭、“中国首善”陈光标都接受了“[冰桶挑战](http://www.chinawyx.com/)”。被点名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落汤鸡”的形象也代表着正能量的传递。主流社会人士通过娱乐自己来宣传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一罕见疾病，并在慈善危机的当下进行颇具创意的募捐在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慈善的热浪。在借用微博为链接纽带的同时，凸显慈善的力量对于这场募捐来说是最大的亮点。据统计，截止2014年8月27日，新浪微博上#冰桶挑战#的话题阅读量已达14.2亿、讨论数超155万、粉丝超9万，位列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第三。慈善借用微博的力量将更多的人团结在ALS渐冻人病症下，用以关注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

随着微博宣传营销声势的逐步壮大，“冰桶挑战”借助自媒体的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的能力，给慈善公益植入新兴的互联网因素，使得在未来的其他公益活动有了更多的想象发展空间来增加关注度。但另一方面，在“冰桶”挑战全球开花的时候，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这些名人的行动炒作意义大过公益。这些名人也借助自媒体的迅速转发在娱乐自己的同时还为自己做出进一步的宣传。尽管活动参与者的初衷或许是不错的，不过公开的指名道姓式的击鼓传花一般的传播方式，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公众影响的同时，事实上却成了一场“刻奇主义”的胜利。“冰桶挑战”在互联网中的迅速商业化、娱乐化、秀场化，也遮掩不了其善款募捐效率继续低位徘徊的现实，花样齐出却廉价的“名人秀”的活动色彩却越来越浓厚，而这种趋势微博等自媒体的大肆宣传后也明显变得变本加厉。在挑战的风尚背后也暴露出对于干旱地区用水的艰辛。互联网中显示出此处浇水正酣，彼处缺水求生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样引人深思。而在2015年3月爆出了陈光标“冰桶挑战的真相”的热门微博话题，让单纯的慈善加上了一些别样的色彩。“冰桶”下是50摄氏度的热水这一真相也被媒体和大众打上了“造假”的商标，也使自媒体在功名的驱使下蒙上了必要的道德标签。当然，陈光标在事件发生后也承认了自己的造假行为，也有自己的理由：“是因为标哥深知水比黄金更宝贵。冰桶挑战的初衷是关爱渐冻人，但后来活动关注点转移到了名人挑战，每次看到一桶桶水被浇在地上白白浪费，标哥都感到无比痛心，都会想起西南人民为了寻找一滴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于是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终结冰桶挑战，实质上为了让浪费水的行为到此为止，用环保节约的方式做慈善，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陈光标的陈述也凸显出了自媒体时代网络在其特点背后的隐患。

以微博为典型代表的自媒体风潮在社会中迅速的发展反映了现今的网络大众希望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来表现自、影响社会的诉求。在这种人为的功名利益的追求下，总会出现一些隐形的社会隐患。尤其是在自媒体自由平等地抒发自我感想的情况，对法律和道德的忽视。矛盾具有两面性，自媒体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不论是好的事情：“马航事件”的推动、“冰桶挑战”的风潮等，还是不好的事件：姚贝娜死亡的一系列报道、手术室合照风波等，这些事件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头版头条”的要求和“点击量”的要求中，自媒体界的媒体伦理现状发人深思。在空前解放的和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系统中，虚拟世界的伦理秩序需要进一步进行重新建设和制定。在信息全面共享的过程中，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媒体伦理的正确导向。

# 三、中外媒体伦理的对比

现代媒体是在国外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有关新闻伦理的研究也比较成熟，中国现代媒体发展较晚，相关研究也还有待继续，但是我们要用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外不同，根据本国国情从国外已有经验中学习并且加以运用，我们要想了解中外媒体伦理情况的不同，可以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 （一）媒体素养教育

媒体素养教育其实与英国，成长壮大在加拿大、美国，距今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从整体范围来看，西方一些发达国际的有关教育不但发展得较早，而且发展得也较快，英法等国家已经将媒体素养教育加入中小学生的必修科目，而在国内，媒体素养教育还只是一些先驱人物的个人主张，尚未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这使得大众传播学在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产业，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则处于萌芽状态。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正式启动至今经过了十几个年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比起西方成熟的媒体素养教育体系还有所欠缺，西方媒体素养有关文献已经有莱恩·马斯特曼的“三大历史范式”，大卫·帕金翰的“四阶段论”[[7]](#footnote-7)，我国关于媒体素养理论的研究却很少，想要更好地推广媒体素养教育还需要有一套能够契合中国实际的媒体素养理论基础。

## （二）对数字的敏感度不同

在新闻报道中，中外媒体对数字的敏感度不同，中国媒体对数字的敏感度低于国外媒体，而数字是新闻报道准确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数字的严要求是也可以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客观真实。“数字意识”根植于西方媒体记者的脑海中，习惯性用数字来分析，这样会使报道更加具有说服力。从2001年9·11，西方媒体关注的除了政府行为，受害者的情绪，更加关注的是伤亡人数；2002年非典，在答记者问上，外国记者执着于询问伤亡人数，却没有中国媒体执着关注。这种差别显示出了中西方对数字的敏感性不同。但是随着受众的变化，更加趋向理性，我们媒体也开始重视数字，使得新闻报道开始趋向理性，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支撑。

## （三）对新闻认识的差异

中外对新闻的认识有较大差异，是对事件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不同，“存在论”意义上的新闻事实的报道是真是的，之后是确保对整个新闻作品中陈述的所以事实是存在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是指报道的新闻实时必须是准确、全面、完整的。[[8]](#footnote-8)我们很多媒体以前在报道事件时经常采用的是“存在论”，有些媒体将一些视频故意剪接，曲解真正说话者的意思，即使每句话都是当事人说出，这种局部真相其实不是真正的事实。这种“局部真相”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各个信息需求群体，不能完整客观的报到整个事件，然而随着与国际的接轨，我们更加应该更多地采用“认识论”，使新闻报道更加准确、客观、可信。

## （四）灾难新闻报道的不同

灾难与人类如影随形，从古至今我们经历了无数灾难，现在人们对灾难的信息诉求越来越强烈。灾难报道能够帮助人们及时掌握灾难引起的变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即时、可行的依据，不仅如此，一国媒体对灾难的报道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地位，所以灾难新闻报道不容小觑。

中国在报道灾难新闻时更倾向于报道宏观的角度报道，而西方媒体更讲究细节，细节更能让受众有感性认识，帮助更好地传递消息。而近些年来，随着媒体人的成熟，我们在报道灾难的时候表现出了更加快速的反应与更加敬业的态度。我们说到对灾难的报道应该更加富有细节，但是过犹不及，有时候过度渲染悲惨气氛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悲情传播”。媒体过度传播悲情现象，并没能真正体现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观——人文主义精神。在报道灾难新闻时要体现两个方面：最小伤害以及保护隐私。在《悲情传播肿的媒体伦理危机——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9]](#footnote-9)这篇文章中就谈到了媒体传播对社会公众带来的身心伤害。悲情传播其实并无对错之分，关键是我们要把握这个“度”。文中提到，在地震中失去十个至亲至爱的人的蒋敏却被记者问：“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这个问题让苦撑了数日的蒋敏说不出话来，一出帐篷就晕了过去，这无疑是无视被采访者的巨大悲痛，直接将对方伤痛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种做法不仅蒋敏不能接受，观众也对这样的提问感到厌恶。并不是说在西方就没有这样案例，只是在西方尊重隐私的社会环境下，制定了例如《新闻伦理纲领》、《报业信条》等规范新闻媒体人的伦理规定。

## （五）对社会报道的不同

前文提到的医患关系紧张的例子，医生在做完手术后与自己的病人合影的照片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究其原因是因为媒体的不正确导向，在美国也有一张照片，内容是做完手术后疲倦的医生坐在手术室的座椅上，但是这却让人感受到了医生的努力与辛苦。同样是对医患关系的反应，不同的照片却能造成不同的影响。前段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决定撤销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原因模糊的说是财务问题，在2008年哥大学生会举办的中文戏剧《寻找李伟》中对黑人使用了种族歧视语言进行攻击，著名的微博账号假装在纽约这样说：“如果排练这出话剧的是一群白人学生，这件事一定会被美国主流媒体狂轰滥炸，被全美国的口水淹没。”种族问题可能在美国更加敏感，但是在美国读大学的留学生们却不懂得这种敏感。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媒体在现在这个社会能够起到一个二次教育的作用，对于种族问题甚至有些民族问题，是媒体应该关心的问题并且起到教育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姚贝娜还有李光耀去世事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媒体的冷漠，为了抢首发，在两位都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新闻稿，就在“等死”！甚至在李光耀先生还未去世时就伪造去世消息，为了抢头条，哪里还顾及了人文伦理！对死者要有起码的尊重，不要打扰在天堂的人。我们的社会包含太多的方面，医患关系，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媒体起到的作用不是激化这些矛盾，而是把真相还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判断，而不是为了抢头条博噱头而提供一些不实报道。

## （六）受众不同

媒体报道的新闻是给受众看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受众，养成了按照数字思考的思维方式，这是他们习惯于从量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社会，而我国媒体长期以来对突发或者灾难事件报道的主体，是放在事件所引发的政府行为上，对于数字并不是那么看重，很多数据也并不公开；国外媒体则是锁定在受害者上，更加充满人文情怀一点，也更加注重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这体现了国内外媒体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价值取向的差异。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中西方文化与价值取向还是有差异的，西方能够接受的我们不一定能接受，报道的差异性存在是正常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大事的关注与共享的更多的信息会使得以受众为中心的新闻报道的主导价值取向会越来越趋同。

## （七）总结

新闻伦理不是普世的，不能脱离他所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比较国内外对事件的报道并不是想说我们做得有多么不好，反而，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存在着不足，西方媒体发展得比我们早，对于他们的经验，我们要学习，对于他们的教训，我们要吸取。媒体伦理这块在中国发展依然不够成熟的地方我们要汲取国外精华，规范媒体人的行为，希望能够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伦理规范。

# 四、启示

通过我们对于社会自媒体、主流媒体的定义以及中美对于不同事件的报道，随着微博微信等大众传播的普及以及推广，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广大的观众、新闻的传播者，我们都应保持一些必要的基本想法。本文章将分为如下几点讨论。

## （一）完善新闻媒体界法律、监督制度

在我国，新闻法并没有出台，这是造成媒体法律混乱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能从零零散散的法律条文中或许一些基本的媒体法律底线。《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0]](#footnote-10)作为媒体报道，不得触犯宪法的底线，也不应对报道事件、群众进行污蔑。201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诽谤罪“情节严重”给予了解释，其中包括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11]](#footnote-11)这从法律方面为维护自媒体道德稳健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应的，我们还可以从《宪法》、《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等法律条文中找到相关规定，这从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于媒体伦理的部分监督。

另一方面，我国不断重视新闻的自由权。随着自媒体不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应的主流媒体也不断开放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从格式还内容方面，都倾向于言论自由化。是但是笔者认为，自由应是建立在相应法律基础上的，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基础的底线。以法律为基础改进媒体行业，会杜绝类似姚贝娜事件为争取头版头条而不择手段的事故发生。

有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社会也需要完善的监督体制来促进法律在媒体界的具体实施。自媒体扩大了网络这个新型传播载体的功能，同时也加大了群众对于媒体的监督。群众可以更轻易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与上级政府交流，也可以指出对于新闻事件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上级政府也应该加大对于媒体道德伦理的监控以及必要的引导，使媒体向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不同监督对象之间相互合作，才能完善整体监督体制。

建立健全的新闻制度，加强舆论监督管理体系，抵制不良新闻，是政府、人大以及各行各类媒体人员需要共同坚持以及奋斗的目标。

## （二）杜绝虚假新闻、坚守道德情操

有了法律的基础，相当于有了底线，但进一步的提升媒体环境，则需要媒体人进一步的改善他们的道德思想。而当今社会，需要升华思想的不单单是简单意义上的记者、编辑，而是整个参与讨论的所有相关人员。微信、微博上的知名人士、明星、公共账号等作为传播新闻的载体，更应该以身作则，对于无事实依据或未经核实的新闻不要乱加评论或者转发，以免引起更多群众受骗。对于谋取头条而背弃新闻原则的媒体，社会因予以严重指责。2015年3月18日假冒微天下报道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之死”不光引起了群众的误会，也是对病重的李光耀先生的一种亵渎。杜绝虚假新闻，用准确的词语还原事实真相，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会使得整个媒体环境愈发整洁。

同时，坚守道德情操也是目前需要的主要改进方向，也是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中，群众参与讨论时可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不应随意扩大事实真相。对于他人隐私，应保持规避态度，即使是名人，也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好奇心而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类似于陈赫“周一见”的记者，虽然为广大的网民带来了一个热议的话题，但就媒体伦理来说，“跟踪”很明显泄露了个人隐私，将个人的事情扩大化放到网上让大家热议并且破坏了其个人的日常生活，虽然不是虚假信息，但也违背了基本的道德标准。保持基本的道德标准，不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破坏他人的行为基础上，作一个有良知且合法合理的媒体人。

## （三）秉承核心价值观（去网络群体极化）

网络群体极化，是美国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ein)提出的，他认为：网络群体的形成往往急于共同的态度与偏好去向，而这种偏好取向使其在网络沟通中缺乏对立观点，而不断增强最初的态度与偏好，从而最终形成极端观点。[[12]](#footnote-12)在网络条件虚拟化的情况下，群众可以扮演不同于真实社会的角色，从而摈弃社会附加于其的外在影响力。在这种条件下，加之对于新闻本身没有深入的了解以及自己的主观想法，在听取了别人的意见之后，认为其说法合理且自我不断地强化某种观念，最终导致极端现象。

与极端现象相关的还有媒体人的素质。自媒体借助于网络平台发展，因为不受某些要求的限制，所以这里汇聚了不同资质的“媒体人”。这些“媒体人”并不是所有都具备良好的品性，这导致了整个网络媒体平台的水准日益下降。骂脏话、传播有违道德风险的信息比比皆是。有时，媒体相关报道对于一件事情刻意地去赞美或者诋毁性的报道，比如使用过分的词语，也会造成民众更加极端的思想，加剧集体群化现象。

为了去网络群体极化，首先需要做的是秉承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提升媒体人自身素质。在媒体的核心理念中应树立核心的社会文化，不偏激，不极端，客观地评论每一件新闻。同时媒体人在发表新闻的时候应不断优化自身的素质，多阅读文章，借鉴优秀他人的书写技巧而少发表自己偏激的想法，或者经过他人审核、听取他人意见后再发表论点，以此提高整个网络的素质和文化背景。

## （四）全方面交流，多方面换位思考（自媒体与主流媒体的互动）

随着网络的普及，自媒体读者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上文中已经有所提及。作为具有权威性的主流媒体，需要自媒体沟通平台的传播及时、言论自由。自媒体的界面清晰简洁，查找方便，可以使得群众更加快捷地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了解的内容。而根据此，主流媒体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在有些报纸上，报纸的排版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有类似于微信推荐形式的版面，方便群众更好的阅读自己想要的文章。同时，有些报纸上加入了上期的群众评论，利用自媒体的优势，更好的服务了主流媒体。

而作为新型的自媒体，则需要主流媒体的说服力、公信力。一些自媒体在打击虚假信息的同时，提高公众的信服度，报道正向的、积极地、有利于群众身心健康的新闻报道。两个媒体间相互交流、互相融合，汲取对方优点，并且两个媒介之间相互交融，相互理解，多方面思考，从而对整体的媒体伦理有了更为准确及优化的思想。

## （五）构建新闻伦理体系

一个体系的构建，势必会影响整体的组织的结构。就新闻伦理来说，构建整体体系，会对整个新闻界新型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构建新闻伦理体系，可以促进媒体与公众、学者与媒体人的有效对话。[[13]](#footnote-13)在媒体伦理中，对于不同的人，往往在观点、逻辑上存在很多差异。构建新闻伦理体系能够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双方从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而使群众不会一味职责媒体行业，而媒体人也可以通过解释内容而消除或减少两方面的争论。同时构建体系平台也可以进一步地提升人员的素养，使高素质的人员以及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更有效的被发掘，而尽量减少无关的、低俗的、不良的新闻报道以及歪曲的、极端的思想。

由上述材料发现，提升我国的新闻伦理道德势在必行，而关于如何进一步的加强道德之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参考文献

[1]罗斌. 网络自媒体研究[D].兰州大学,2009.

[2]叶耿标. 基于自媒体平台的传播伦理研究[D].广西大学,2013.

[3]朱严峰. 自媒体伦理研究[D].广西大学,2013.

[4]林晖. 中国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之构建[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2:41-47+94.

[5]刘慧. 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互动研究[D].辽宁大学,2012.

[6]莫梅锋 ,刘潆檑. 论主流媒体[J]. 新闻爱好者,2005,05:4-6.

[7]师曾志. 网络媒介事件及其近年来的研究现状与特点[J]. 国际新闻界,2010,06:86-90.

[8]陈奕. “媒介事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

[9]唐琳. 从“悲情传播”现象看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11.

[10]姜秀珍. 中外媒体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差异原因探析——由防“非典”新闻发布会上国外记者对疫情数字信息的关注谈起[J]. 国际新闻界,2003,05:14-18.

[11]陈翔. 悲情传播中的媒体伦理危机——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4:31-37.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4]网络群体极化：[美]凯斯.桑斯坦.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7

[15]李健，张国良，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引发的新闻伦理讨论 新闻记者，2015.02.05

1. 百度百科：主流媒体定义 [↑](#footnote-ref-1)
2.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研究报告 [↑](#footnote-ref-2)
3. 百度百科：媒介事件定义 [↑](#footnote-ref-3)
4. 林晖. 中国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之构建[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2:41-47+94. [↑](#footnote-ref-4)
5. 朱严峰. 自媒体伦理研究[D].广西大学,2013. [↑](#footnote-ref-5)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footnote-ref-6)
7. 唐琳. 从“悲情传播”现象看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11. [↑](#footnote-ref-7)
8. 姜秀珍. 中外媒体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差异原因探析——由防“非典”新闻发布会上国外记者对疫情数字信息的关注谈起[J]. 国际新闻界,2003,05:14-18. [↑](#footnote-ref-8)
9. 陈翔. 悲情传播中的媒体伦理危机——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4:31-37. [↑](#footnote-ref-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footnote-ref-10)
1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footnote-ref-11)
12. 网络群体极化：[美]凯斯.桑斯坦.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7 [↑](#footnote-ref-12)
13. 李健，张国良，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引发的新闻伦理讨论 新闻记者，2015.02.05 [↑](#footnote-ref-13)